

岑麒祥 译

# 国外语言学 论文选译



语文出版社

# 国外 语言学 论文选译

岑麒祥 译

语文出版社

GUOWAI YUYANXUE  
LUNWEN XUANYI

(京) 新登字 074 号

GUOWAI YUYANXUE LUNWEN XUANYI

国 外 语 言 学 论 文 选 译

岑麒祥 译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7.625 印张 180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3.70 元

ISBN7—80006—485—9/H·118

## 内容简介

本书是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先生生前编译整理的最后一部书稿。共收法国、英国、美国等七个国家九个语言学家的十篇论文，其中有几篇是经典性的名作。本书适合语言专业的师生阅读，对语言学工作者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前 言

这本书收集了我近些年来翻译的国外语言学家所写的论文共 10 篇。其中最早的写于本世纪初，最晚的写于本世纪末，都属于近代语言学的范围。

近些年来，我翻译的国外语言学家所写的论文并不只这些，其中有些是比较浅显的，有些却相当艰深。理论浅显的只适合于初学者使用，但是要进一步深造，必须找一些立论比较高深的去钻研。这样才能避免老是在原地上停步不前。本书就是为了适应这一类人的需要而编译的。

语言学，特别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是以全人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因此，我们研究语言学不能只限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学派。可是，有些人由于受所认识的外国语所限制，多只能和一两种语言打交道。所以他们研究的范围就显得很窄小。本书所收的 10 篇论文出于 9 个语言学家之手。论国籍，有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也有罗马尼亚的，瑞典的和丹麦的，就是想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过去的这种局限性。

此外，为了结合我国语言学界的情况，所选文章的内容多着重于大家所关心的理论、方法和当前发展的趋向。此外，距离得比较远的，如机器翻译、数理语言学和统计语言学等都没有收入。

末了，本书所收论文，有 4 篇是发表过的，其余 6 篇都从未

与世相见。发表过的再来重印，主要是由于初次发表时过于匆忙，付印时未及仔细校对，出版后才发现错误不少，只好等重印时才来改正。其余的虽然没有什么错误，可是初版印得太少，现在已不容易找到。现在再来重印一次。这种苦衷料想是很容易获得读者谅解的。其余各篇如有错误，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岑麒祥

1988年5月31日

（此处为大量模糊不清的印刷文字，内容无法辨识）

# 目 录

|                         |                    |
|-------------------------|--------------------|
| 前言 .....                | (1)                |
|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 .....       | 【法】A.梅耶 (1)        |
| 历史和地理可以解释某些语音上的发展 ..... | 【法】A.G.奥德里古尔 (86)  |
| 关于统一的民族语言 .....         | 【罗马尼亚】A.格拉乌尔 (94)  |
| 个别与一般, 偶然与必然 .....      | 【罗马尼亚】A.格拉乌尔 (103) |
| 心理学和哲学对语言研究的贡献 .....    | 【瑞典】B.马尔姆贝格 (114)  |
| 现代语言学的方向 .....          | 【美】E.郝根 (135)      |
| 结构语言学 .....             | 【丹麦】V.布龙达尔 (151)   |
| 近代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 .....       | 【德】E.卡西勒尔 (160)    |
| 语义学的最近发展 .....          | 【英】S.乌尔曼 (183)     |
| 普通语言学的最近趋向 .....        | 【法】E.班维尼斯特 (201)   |
| 附录: 人名索引 .....          | (215)              |

#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

【法】A. 梅耶 \*

## 序

我接到宋墨费尔特先生的通知，说最近由斯唐教授发起，在克里斯提安尼亚（即今奥斯陆）创办的规模宏大的学术机关，比较文化研究所，要约我去参加开幕演讲会。我很乐意，马上就答应了。

把这邀请消息预先告诉我的这位青年学者曾在大战期间和法国的语言学家一道做过几年工作。他在我们这个小团体里成了大家的朋友。他的祖国语言学的发展多有赖于他的努力。我很高兴能够同他重新见面，并且在他的祖国同他一块儿做短期的工作。

我能够参加这个对于人文科学的研究将有极大贡献的新机构的开幕典礼是极荣幸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曾经就手头上所有的材料做过不少工作，但是这些材料都已用完了。现在从事大规模的、有系统的调查的时候已经来到了。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材料，把那些现在为大家所承认的理论发扬光大起来。另

---

\* A. 梅耶 (Antoine Meillet) 是法国近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家。生平著作丰富，绝大多数跟历史比较语言学有关。这篇论文是他于 1924 年应挪威比较文化研究所的邀请到该所参加开幕典礼时所作学术演讲稿。其后许多国家都有翻译。苏联语言学家高尔农曾誉为所有同类著作中最好的一本，历久而不衰。我的最初译稿曾刊于广州中山大学《语言文学专刊》1 卷 1-4 期，1957 年在北京出过单行本，现再校订重刊于此。所据版本为 A. Meillet,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1984 年新排本，巴黎。

一方面，使从事研究人类和人类文化各个方面的学者得到一个接触的机会，也是很重要的。不明白使用那种语言的民族的生活情况就不能了解这些语言，不了解那些人的语言也就不能真正明白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习惯。这个新成立的学术机关是包括各方面的整体，说明它所研究的对象（即人类）也是包括各方面的整体。我们很希望别的地方也有同样的组织，并且有充足的经费从事各种调查。

我得到各位创办人同意选定的这个讲题也就是我们现在应当考虑的一个题目。30年来，我们就1875年至1880年间所拟定的那些原则取得了我们所期待的结论之后，历史语言学又重新回到了酝酿时期。新进行的调查使我们得到了一些意外的结果。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努力过要把语言的一切变化列为“规则”，甚至于“一般的规则”，从来没有人企图这样细密地钻研那些最特殊的事实，并且深入理解创造语言新现象的人类心理。从那些最古的语言（它们的变化只表现出一些轮廓）以至各种现代语言（它们的事实具体而且特殊，细节掩盖住总的趋势），我们观察到一些极不相同的事实。语言学已经和一切毗邻的学科发生接触，我们希望能从这里找到一些解释。——除了印欧系语言以外，其他各种语言的历史研究虽然进行得太慢，可是也有所进展，不过那些在印欧系语言领域里得到成绩的办法并不是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应用的。我们必须考察我们采用过的那些方法，看看它们是否合用以及怎样才能够扩大它们的用途，并且把它们加以改革，以适合新领域研究的需要而不致降低它们的严密性。

近年来，许多语言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些证明得极差的假设，所以我们更加有必要把这些方法加以考察。新的词源研究作得很多，但是大多数连一点证明的迹象也看不出来。目前大家对于保证词源的比较作得正确的条件还须有一致的意见，所以对词源研究作详细的批评是徒劳无功的。如果大家承认这本书里所陈

述的原则有稳固的基础。那么，大部分近年来所提出的关于古印欧系语言的复杂假设和关于印欧系语言的词源，就几乎用不着我们来考察了。这个讲稿里虽然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讨论；但是对于许多不能满足严格方法要求的新作品，也有一些会意的批评。

我们打算对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发表什么新的意见，而只是想把那些可以而且应当在历史语言学中采用比较方法的条件准确地决定下来。读者如果能够正确地理解这种方法的价值和范围，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这里所发挥的意见是在演讲以后才写定的。写作时曾经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尤其是宋墨费尔特先生的批评，我谨在这里向他表示谢意。

我希望——不过希望也许是空的——这些讲稿像在克里斯提安尼亚一样能够在广大读者中得到宽容和善意的接受。

克里斯提安尼亚，1924年9月，梅耶。

## 一. 比较方法的定义

进行比较工作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从比较中揭示普遍的规律，一种是从比较中找出历史的情况。这两个类型的比较都是正当的，可又是完全不同的。

世界上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关于动物的故事：动物与人的相似之点是这样明显，所以把一些人类所固有的行为加于动物身上，借以表明一些不容易直接使人理解的事情，那是很自然的。我们可以把这些故事加以比较，确定它们的形式、性质和应用范围，从而建立一个关于动物故事的一般理论。我们从中发现的相同之点是由人类的共同心理造成的；不同之点是由文明的类型和程度的差别造成的。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知道人类的共同性质，但是对于它的历史却一点也没法知道。

假如我们和一位法国的青年学者杜美齐尔先生一道去研究那些关于“长生水”的印度·欧罗巴神话，所得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种以为有一种水可以使人长生不死的想法实在太自然了，所以不会是什么民族的特点。可是在每个印度·欧罗巴语民族中都或多或少碰到这样在一个巨桶里酿制“长生水”的传说。这个传说还加上假未婚妻的故事或神仙和恶魔搏斗的传说。可见这里面包含着许多特殊的情节。这些特殊的情节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它们的结合决不是偶然的。

假如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和那些用来表达这个意义的声音之间有一种或松或紧的联系，就是说，假如语言的符号可以撇开传统，只用它的音值本身可以使人想到它所表达的概念，那么，语言学家所能采用的就只有这种一般的比较方法，任何语言的历史也就都不会有了。

但是事实上，语言的符号是任意规定的，它只有依靠传统的

力量才能有意义。如果在法语里，人们用 *un, une* 来表示“一”；用 *deux* 来表示“二”，……那并不是因为 *un, une* 和 *deux* 本身和“一”、“二”等意义有什么关系，而只是因为说法语的人教给学法语的人习惯上是这样的。

只是因为语言符号具有这种完全任意的性质，所以才能有现在所要研究的这种历史比较方法。

例如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数词是这样的：

|    | 法语              | 意大利语            | 西班牙语            |
|----|-----------------|-----------------|-----------------|
| 一  | <i>un, une</i>  | <i>uno, una</i> | <i>uno, una</i> |
| 二  | <i>deux</i>     | <i>due</i>      | <i>dos</i>      |
| 三  | <i>trois</i>    | <i>tre</i>      | <i>tres</i>     |
| 四  | <i>quatre</i>   | <i>quattro</i>  | <i>cuatro</i>   |
| 五  | <i>cinq</i>     | <i>cinque</i>   | <i>cinco</i>    |
| 六  | <i>six</i>      | <i>sei</i>      | <i>seis</i>     |
| 七  | <i>sept</i>     | <i>sette</i>    | <i>siete</i>    |
| 八  | <i>huit</i>     | <i>otto</i>     | <i>ocho</i>     |
| 九  | <i>neuf</i>     | <i>nuove</i>    | <i>nueve</i>    |
| 十  | <i>dix</i>      | <i>dieci</i>    | <i>dies</i>     |
| 二十 | <i>vingt</i>    | <i>venti</i>    | <i>veinte</i>   |
| 三十 | <i>trente</i>   | <i>trenta</i>   | <i>treinta</i>  |
| 四十 | <i>quarante</i> | <i>quaranta</i> | <i>cuarenta</i> |
| 一百 | <i>cent</i>     | <i>cento</i>    | <i>ciento</i>   |

这里面相符之点决非偶然。所以如此，是因为从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差异中可以找出一些确定的对应规律。比方 *huit, otto, ocho* “八”等词之间的差异乍一看来虽然很大，但是并非偶然，因为这样的对应还有许多，如法语的 *nuit* “夜”，意大利语的 *notte*，西班牙语的 *noche*；或法语的 *cuit* “煮”，意大利语的 *cotto*；以至法语的 *lait* “乳”，意大利语的 *latte*，西班牙语的

leche; 法语的 fait“事实”, 意大利语的 fatto, 西班牙语的他cho 等等。这些显而易见的相似点固然给我们指出了应当遵循的途径, 但是可以利用的却只有那些语音的对应规律。

在显而易见的相似点所指引的可靠途径上, 常常出现可供佐证的独特细节。比如 un 和 une 有阴阳性之别, 而其他数词却都没有。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

因此, 我们可以假定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三种语言的数词出于同一个来源。在这种情况下, 经验告诉我们, 可能的来源只有两个: 一, 这三组数词同出一源; 二, 这三组数词中, 有两组的形式是由另外一组借来的。在这些例子里, 第二个假设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这三种语言中, 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语言的形式来解释另一种语言的形式。法语的 huit 不可能出于意大利语的 otto 或西班牙语的他cho; 意大利语的 otto 不可能出于法语的 huit 或西班牙语的他cho; 西班牙语的他cho 也不可能出于法语的 huit 或意大利语的 otto。由此可以证明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这三种语言的数词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 而这个出发点不是法语, 不是意大利语, 也不是西班牙语。

在以上所举的例子中, 相似点又多又完备, 对应规律也极易认出, 连门外汉也可以马上看得出来, 用不着语言学家才能看出它的证明价值。假如我们考察一些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相隔得较远的语言, 如梵语、古雅典希腊语、拉丁语和古典阿美尼亚语等, 它们的相似点就没有这样显著, 对应规律也比较难于确定。

|   | 梵语   | 古雅典希腊语 | 拉丁语  | 阿美尼亚语 |
|---|------|--------|------|-------|
| 一 | ékah | hēs    | Ōnus | mi    |
|   | ékā  | mia    | Ōna  |       |
|   | ékam | hen    | Ōnum |       |

【以上三个形式中, 第一个是阳性的, 第二个是阴性的, 第三个是中性的。阿美尼亚语的语法没有性的区别。】

|   | 梵语     | 希腊语 | 拉丁语 | 阿美尼亚语 |
|---|--------|-----|-----|-------|
| 二 | d(u)vā | dyo | duo | erku  |

【“二”这个数词有性的区别，这里只举出阳性的形式，“三”和“四”也是这样。】

|   | 梵语                | 希腊语      | 拉丁语      | 阿美尼亚语  |
|---|-------------------|----------|----------|--------|
| 三 | trāyah            | trēs     | trēs     | erek   |
| 四 | catvārah          | téttares | quattuor | čork   |
| 五 | pāñca             | pēnte    | quinque  | hing   |
| 六 | ṣaṭ               | heks     | sex      | veç    |
| 七 | saptā             | heptá    | septem   | ewt 'n |
| 八 | aṣṭā <sup>①</sup> | óktō     | octō     | ut 'n  |
| 九 | nāva              | ennēa    | nouem    | inn    |
| 十 | dāça              | déka     | decem    | tasn   |

除了“一”这个数词暂且不论，希腊语、拉丁语以及梵语间的对应可以说大部分是显而易见的，可是阿美尼亚语和其他语言间的对应就没有这样明显了。

但是我们试把阿美尼亚语的各种事实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其中对应点的证明价值。

比方阿美尼亚语的 erku“二”和拉丁语的 duo 等相比差得很远，但是，其他一些对应表明阿美尼亚语的 erk- 可以跟其他语言的 \*dw- 相当。例如希腊语有一个表示“怕”的词根 dwi-，阿美尼亚语的 erkiw-“怕”也有 erki 这个词根；希腊语有一个很古老的形容词 dwārón 表示“长久”，阿美尼亚语也有一个表示“长”的 erkar（参看以下第 25 页）。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对应规律，古印欧语的 \*dw- 在阿美尼亚语变成了 erk-。

作为复合词的第一个成分，希腊语有一个 dwi-，阿美尼亚语也有一个 erki-，这一组特殊的对应是不容许我们有任何怀疑的（参看以下第 78-79 页）。

阿美尼亚语 erek “三”和 čork “四”等词的形式和希腊语的 trēs, téttares 相差很远；但是它们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用词类的对应来解释。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细节，就是在梵语和希腊语里，“三”和“四”都有正规的变格形式，而自“五”以后的数词却都是不变格的；在阿美尼亚语里，“三”和“四”也有正规的变格形式，词尾-k 是阿美尼亚语复数主格的特别记号，而这个记号在其他各个数词里是找不到的。

可见这些数词形式的对应点，在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和阿美尼亚语里乍看起来虽然没有像在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里那么明显，其实是同样可靠的。

这些对应之点不能用各种语言间的相互借贷来解释。我们可以假设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但是还要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来加以诠释。这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目的。

\* \* \* \* \*

我们刚才提出了工作方法的原则。这种方法乍看起来似乎很复杂，难以运用，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用来建立语言的历史。

因为语言的历史决不是只靠一些按照年代排列起来的文献就可以建立起来的。语言学家利用古代的文献只不过是为了从那里面观察语言的状况。当然，一切古代语言的事实都只能依靠各种文献来观察。比方我们要考察古雅典希腊语或哥特语、古典阿美尼亚语或古斯拉夫语，就得依靠一些书面的史料。这些史料，用批评的眼光来加以诠释，是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材料的，并且时常可以使我们对于古代语言的某些状况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但是这种研究只能使我们确定一种语言在某一时代某种条件下的状况。直接观察古代语言已是不可能的了，考察文献只是直接观察的代用品而已。

即使是最好的文字（书面语言）也不能准确地记录口语的连续变化。文字（书面语言）时常是固定了的，世代相传，它的形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就是在文字（书面语言）还没有完全固定的时候，书写习惯大体上总要受以前形式的支配——这些形式又不是大家都熟悉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拉丁语的典型例子来加以说明。在伯劳图斯和圣奥古斯丁所用的书面语言之间就存在着细节上的差别，但是在写法上却差不多没有什么不同；语法形式和主要的词汇都还是一样。语文学家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寻找拉丁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差别。他们把一个语法学家所能采用的一切细密准确的方法都应用到了这种研究上面去。他们确实也找到了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在这些差别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属于文学方面的。伯劳图斯那些为大众而写的喜剧是不能与西塞禄的演讲录和凯撒这位纯语派的公报相提并论的。那些希腊派诗歌所用的语言和散文所用的语言并不相同。这个作家和那个作家之间也有一定差别。但是大家所写的和学校里所教的实际上却只有一种拉丁语。

此外，在各种文献里所用的各种形式当中，也只有用比较的方法才能指出哪些对以后的语言史有影响的形式。比方表达“耳朵”这个意义的，我们在拉丁语的文献里可以找到一个 *auris*，还有一个派生词 *auricula*。拉丁语的古代文献并没有说明这两个形式当中哪一个占优势。*auris* 是通用的形式，可是各种罗曼族语言的形式，如法语的 *oreille*，意大利语的 *orecchia*，西班牙语的 *oreja* 等都是从 *auricula* 变来的。我们只有把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加以比较，才能知道作为罗曼族语言的基础的是哪一个形式。

另一方面，继续存在下去的并不是书面语言。作家的作品所保存的书面拉丁语和罗曼族语言所继承的口头拉丁语之间是有差

别的。这些差别随着个人和他们的文化程度而不同。然而罗曼族语言所继承的并不是书面拉丁语。比方“口”在书面拉丁语里是 *os*，但是继续存在下来的却是口头语言 *bocca*。像这样的例子多得很。

历代的文献虽然能提供语言在前后各个时代的状况，可是我们在文献上却找不到语言的连续性。从古拉丁语到各罗曼族语言，主要的变化都是在书面拉丁语和各罗曼族语言的最早遗文之间出现的那些在公元 3 世纪至 10 世纪用拉丁语写作的人，因为受了他们那种已与古拉丁语完全不同的语言的影响，确实无意中误用了许多形式。这些形式在古拉丁语里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不依靠对罗曼族语言知识的帮助，就没法估计这些笔误的价值，没法理解这些语言学上的证据。从罗马帝国时代到加洛林基时代<sup>②</sup>，那些不大通顺以至无意中写出违背古典习惯的谬误的人，他们所写的拉丁语文献，特别是在确定语言现象的年代方面，为罗曼族语言比较语法提供了好些正确的材料，但是他们所提供的宝贵线索却只在于指导比较工作；没有比较工作，这些线索就都成了落空的了。假如罗曼族语言在没有被记录下来之前就死去，古典拉丁语就会变成支离破碎，无法理解；我们对于已经完成的变化就不能建立任何精密完善的理论。语言变化的全部要点就在我们的眼界以外了。

波斯语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可注意的例子。我们可以从各个帝王的碑文上认识到——当然是很不完备的——大流士<sup>③</sup>和泽克西斯<sup>④</sup>时代的波斯语。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的波斯语没有留下任何证据。然后才又找到了贝尔威语<sup>⑤</sup>。

但是，第一，这种贝尔威语不是从阿契美尼朝<sup>⑥</sup>帝王的碑文上所载的语言流传下来的（我们一直以为是如此，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不是）。我自己曾说过，德迭斯可先生说得更精密，更完备，萨散尼<sup>⑦</sup>朝代文献中的贝尔威语——就是波斯书面语言的祖